

[美]卡尔·多伊奇 著

国际关系分析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 际 关 系 分 析

〔美〕卡尔·多伊奇 著

周启朋 郑启荣 李坚强 曹燕萍
金 锋 钱 波 田 程 译
吴宝璐 杜仲瀛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rentice-Hall, Inc. 1988

根据美国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吴力超

封面设计：王麟生

国际关系分析

[美]卡尔·多伊奇 著

周启朋 郑启荣 李坚强 曹燕萍 译

金 锋 钱 波 田 程

吴宝璐 杜仲瀛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成功信息处理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5 字数：311000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5012-0440-3/D · 75 定价：6.10 元

本书各章翻译分工如下：

周启朋，第四、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十一章；郑启荣，第五、六、七章；李坚强，第八、九章；曹燕萍，序言、第一、二、三章；金锋，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钱波，第十二、十三章；田程，第十章。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较有影响的著作，1968年出版后又于1978年和1988年连续再版，我们根据1988年版全文译出。作者在新版中增补了专论国际恐怖主义和秘密战争的一章，并对今后至2010年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作了研究和预测。

我们翻译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以推动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于本书作者的理论观点和对国际政治事件的看法，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为使我国学术界和各界读者了解本书原貌，我们照原书全文译出，未作删节。

目 录

前 言	1
序 言	4
第一部分 我们所要了解的是：国际关系的实质	
第一 章 十二个基本问题	12
第二 章 思考工具：几个基本概念	18
第三 章 权力与民族国家	29
第四 章 权力的限度：象征与现实	62
第二部分 国际政治行为者	
第五 章 集团和利益	72
第六 章 精英的权力	88
第三部分 行为者的利益：控制过程与冲突过程	
第七 章 全方位的利益集团	98
第八 章 国家如何自我控制	106
第九 章 对外政策是如何制订的	125
第十 章 对外政策部门	151
第十一 章 国家之间是如何发生冲突的	173
第十二 章 外交和联盟	217
第十三 章 丧失控制与战争形式	229
第四部分 寻求和平	
第十四 章 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新老恐怖主义	244

第十五章	升级和战争之外的一些选择.....	257
第十六章	国际一体化和超国家一体化.....	267
第十七章	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283
第十八章	区域性组织,通向一体化的一条 途径.....	304
第十九章	达成与维持一体化.....	332
第二十章	相互依存、依赖和促进平等:世界 将走哪一条道路?	348
第二十一章	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378

前　　言

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 30 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有办法对付饥荒和瘟疫，但迄今为止，在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武器所具有的威力面前，以及在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行为举止方面，我们却一筹莫展，无以为计。

由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工具及战争武器，民族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成为国际冲突媒介体的危险，蕴育着使这种冲突升级从而导致相互摧毁和共同灭绝的潜在可能。一个民族国家有能力控制发生在本国境内的大多数事件，但对于发生在国界以外的事，即使这些事件是它自己造成的，它却无能为力。

在国际关系这个人类活动的领域里，无法避免的相互依存与不适当的控制相互交织。我们既无法逃避世界事务，也不能完全使它符合我们的意愿。我们只能在使自己适应世界的同时努力调整这个世界。在这一有限的范围里，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我们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念，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之发扬光大。

运用国际关系越来越不容易，而且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就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过去 30 年间，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这些进展包括在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方面的变化，以及由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新兴的行为科学与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传统学科相结合而产生的变化。伴随着理论方面的这些变化，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进展，统计程

序在分析中得到运用，可利用的实证经验资料也越来越多。我试图在本书中把这些新型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介绍给读者。所有这些变化使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专业化，从而使过去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文献著作成为黯然失色的过时品了。

然而，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是如此重要，仅仅把它们留给专家们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年轻人原先一直以为世界事务与他们无关，但等到应征入伍后，他们就不再这样想了。既然我们的生活如此深受国际事务的影响，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又如此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增强自己的理解能力、决断能力和行动能力。

知识不等同于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激励人们去探求知识，并使探求所得的某些成果突出出来。知识将告诉我们哪些价值观念会发生冲突，并告诉我们在何时何地我们所采取的手段非但不能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服务，相反却会使它们受到损害。

在本书中，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读者可以接受或屏弃我的观点，也可以有选择地接受或屏弃。我努力用论据来证明我所有的论点，不让我个人的爱好与偏见愚弄自己。在探索现实主义和真实性方面我成败如何，读者可作出自己的判断。你可以对本书列举的事实进行核实，并添补你所发现的其他有关事实。此举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积极从事一项共同的事业——在世界各地寻找一条导向和平与自由的通道。这是一项艰难的探索工作，但我们决不能退缩躲避。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的多方面帮助。我曾多次得到同行们的指点。他们是：小海沃德·阿尔克、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肯尼思·博尔丁、理查德·查德威克、罗伯特·达尔、刘易斯·埃丁杰、布鲁诺·弗里奇、哈罗德·古埃茨考、厄恩斯特·黑斯、斯坦利·霍夫曼、迈克尔·赫德森、塞缪尔·亨廷顿、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欧文·贾尼斯、赫伯特·凯尔曼、亨利·基辛格、

U·W·基辛格、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罗伊·马克里迪斯、理查德·梅里特、詹姆斯·格里尔·米勒、约瑟夫·奈、唐纳德·普恰拉、卢西恩·派伊、阿纳托尔·拉波波特、鲁道夫·拉梅尔、布鲁斯·拉西特、丹克瓦特·拉斯托、伯顿·斯佩恩、理查德·萨维奇、托马斯·谢林、欧文·朔伊茨、戴维·辛格、理查德·斯奈德、哈罗德·斯普劳特、雷蒙德·坦特、查尔斯·泰勒、罗伯特·特里芬和西德尼·维巴。还有一些曾使我得益匪浅的已故学者，他们是：亚历山大·埃克斯坦、鲁珀特·爱默森、卡尔·弗里德里克、汉斯·科恩、哈罗德·拉斯韦尔、丹尼尔·勒纳、罗伯特·马乔林、塔尔科特·帕森、伊锡尔·普尔、约瑟夫·舒姆皮特、赫尔曼·韦伦曼和诺伯特·威纳。当然，他们对我的观点和错误不负任何责任。

在研究、计算机处理和其他工作中，我得到了欧文·布帕、詹姆斯·查普曼、戈登·福勒、琳达·格罗夫、克里斯·考尔布、彼得·纳切兹、布里吉蒂·罗森布希和菲利普·冯·斯托芬伯格的帮助。重要的秘书工作大部分是由艾娜·弗里塞完成的。10年来，她以敏锐的理解力和出众的组织才能为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帮助。在不同阶段，我还得到过伊夫林·纽马克以及海伦·埃尔森、露西尔·麦克那和卡伦·萨尔斯伯格的帮助。在编撰本书的第三版时，钱德勒·芬利，尤其是苏珊娜·舒尔茨给了我巨大的、常常是超出他们职责范围的帮助。

本书好几章的初稿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坐落在意大利贝拉焦的塞贝洛尼别墅写成的。那里真是个做学问的理想处所。本书使用的部分研究成果分别由卡内基公司、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密执安大学精神健康研究所、柏林社会研究科学中心和埃默里大学所提供。埃默里大学的卡特中心，以及该中心同仁会的协调人戴尔·鲍威尔女士为第三版的完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我谨向上述个人和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尔·多伊奇

序　　言

在美国人看来，居住在世界上的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在全世界 50 亿人口中，只有 2.36 亿是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 1/20。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地域、财富、知识、（以至）力量上，我们都是整个人类中的一个少数。我们的国家虽然幅员辽阔，但也仅占美洲的一小半，而美洲则不过是世界五个大洲中的一个。就经济来说，即使按照对我们极为有利的计算方法，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仅占世界总额的 1/4，而我们在世界钢铁和能源生产方面所占的份额则还要低。在知识开发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中，美国人仅占约 1/3。在世界伟大的发明家和创造家中也只有少数是美国人。所有这些都表明，直接处在我国控制之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大大低于世界总潜力的一半。

然而，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在全人类中都只是一个少数。例如，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他们也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 1/4。所有的东印度人（把他们当做一个民族计算）加在一起，也仅占世界人口的 1/6 弱。苏联的工业力量近年来增长很快，但它的人口却不到世界总人口的 1/17，国民收入也仅占美国的 2/3 左右，占世界国民收入总数还不到 1/6。对于其他小得多的国家来说，在地球上，它们就更是少数了。

不过，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不论其大小如何，都必须很好了解“外国人”正在做什么。如果一个国家想凭借其有限的力量去取得超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成就的话，它就必须赢得“外国

人”的合作。这一点说来简单，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外国人千差万异，首先，他们各自的外表举止就是显著的特征。世界上 2/3 强的人不是白种人^①。到本世纪末，这一比例数很可能上升到 3/4。另外，全世界 2/3 强的人不是基督教徒。不过，假如说基督教徒在世界人口中是个少数的话，那么，穆斯林、犹太人、佛教徒、印度教徒、共产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学派、逻辑实证论者，以及信奉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哲学或思想的人，在世界总人口中同样是个少数。就我们所知，情况也的确一直如此。

人类在其天性、需求和希望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语言、文化、宗教、哲学、思想等方面，尤其是在政府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异。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一个组织，或一种宗教教义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过全人类，虽然历史上和现代的不少统治者、组织及宗教教义曾经企图或声称要做到这一点。

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却又有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今天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变得更加密切了。这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世界上即使是相距最遥远的人至多也只能相隔半个地球的长度，即约为 12500 英里，或大致相当于从纽约到越南胡志明市的距离。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相隔的距离大多数则要近得多，如夏威夷的珍珠港；日本的东京与广岛；法国诺曼底半岛上的奥马哈和犹他海滩；德国的东西柏林；台湾岛上的台北；南朝鲜的汉城；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西奈半岛；孟加拉国的达卡；安哥拉的罗安达；黎巴嫩的贝鲁特；古巴岛上的哈瓦那。在当代成年人的一生中，在某一时候发生在上述某一地方的震惊世界的事件，都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仅影响美国人的生意和个人机会，而且

^① 这些非白种人包括黑色、棕色、红色和黄色皮肤人种——在世界总人口中他们均属少数群体。

还影响他们的纳税、物价、币值等等，并致使一批美国军人在公开的或不宣而战的战争中葬身于异国他乡。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军事方面发展最快。坐喷气式飞机，只要花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能从一地飞往离它最远的另一地，而导弹只需大约 40 分钟就能完成上述距离的飞行。几乎能即时送达的世界通讯早已淘汰了原先的无线无像装置，现在它能够通过环球通讯卫星由电视传送音像。（装有高倍摄影装置的卫星已使间谍侦察在高度和精确度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还有其他一些或许是微妙的迹象可以表明人类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日益增强。据说，美国的所得税税率是在莫斯科制定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和选民觉得我们在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方面至少必须与俄国人旗鼓相当。基于同样原因，我们的所得税税率的附加成分则是在北京制定出来的。然而，莫斯科与北京也声称它们之间至少应同对方的实力相当，并保持平衡，同时还要与我国可能用以对付它们的那部分国力相抗衡。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那部分军费开支——即俄国和中国的家庭主妇所做出的牺牲——实际上取决于华盛顿的政治决定。这个道理既适用于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同样也适用于中小国家。所有国家在政治和战略上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国家，无论它如何弱小，都无法在完全的与世隔绝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保卫自己的人民和财富。同样，任何国家，无论它如何强大，也无法强迫其他国家俯首听命，或强迫它们迅速皈依它的信仰。

然而，我们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相互依存关系远不仅仅限于政治和实力。我们每个人都模糊地知道，科学、技术和医学是不分国界的，即是“国际的”，但很少有人会静下来思考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意味着，要是没有外国发明和贡献的巨大帮助，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够在技术、繁荣和健康方面达到今天的水平，保持今天进步速度。美国科学的一位伟大先导、物理学家卡尔·康普顿曾经提醒我们说：在导致核能释放的 12 项基本发

现中,只有 3 项是由美国人作出的。这个使世界改观的发现中 1/4 是由占世界人口 1/20 的美国人作出的,这无疑可以成为我们为自己的民族骄傲的理由,但这极为重要知识的 3/4 需要依靠外国人。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若无外国人的帮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养活本国的人民。在我们的医院和诊所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生命因为使用别国科学家发现和开发的药物而得到了拯救。在上半个世纪里,英国人发现了青霉素,德国人造出了磺胺药物,法国人发现了放射性同位素,加拿大人则合成了胰岛素。如果我们所有的药物包装上都鲜明地标上发现者的姓名和国名,那么在每个药房柜台前,我们都能上一堂世界国籍课了。一旦由外国人发明的治疗方法与药物失去效用,那么在我们街头的病死者将达到惊人的数目。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虽然世界上的国家在战略、科学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在语言、教育、经济以至国内政治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却在逐渐减弱。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对一些证据进行考查,这些证据表明英语和法语这两种老的世界语言的相对重要性正在或多或少地减弱。在世界许多地方,它们已部分地被众多的民族语言,有时是地方语言所替代。在大多数国家,伴随着经济和文化进步以及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民族语言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就整个世界来说,自 1960 年至 1974 年,在国外学习过的学生总数增长了 3 倍,从不到 1200 万增加到 3300 多万。但由于世界学生总数增长了 3 倍多,从 2.38 亿增加到 7.5 亿,所以在国外学习的学生比例反而从 4.9% 降为 4.4%。在国外学习的美国大学生,60 年代初约占学生总数的 0.5%,到 1974 年,这个小百分比降至 0.22%,1987 年进一步降至 0.16%。^①

^① 引自《1982—1983 年美国统计摘要》(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82 年),第 160—161 页,以及《198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第三卷(纽约,联合国),第 420 页。

另外，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下降。现代技术是一种代用品的技术：许多过去需要进口的东西，如羊毛和丝绸，现在可用本国制造的产品代替了，如奥纶和尼龙。与此同时，诸如住房、学校及医疗保健等国内劳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部分不断扩大。结果，出口商与进口商，以及所有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利益集团，在各自国家的财富与劳动力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日趋下降，他们拥有的对政治施加影响的潜在力量也因此日益减少。然而，在某些重要商品上，如石油、小麦和计算机，国际间的相互依存仍然存在，有时甚至有所增强，特别当出口国采取行动提高价格以后，人们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70年代的两次石油大涨价，迫使许多石油进口国不得不把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对外贸易，因为它们得靠增加出口来弥补因石油涨价而造成的亏损。当石油价格如1986年那样再次微跌时，这对世界经济又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世界对石油的相互依存的增强趋势未有根本性改变。

在对上述事实和趋势进行初步考察后，对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一次总结确非易事，但却极为必要。在这个既无法逃避又无法控制的住满外国人的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一人种、每种教义，都不过是一个少数。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世界是无法控制的，因为它既纷繁多元，又千姿百态；同时，这个世界又是无法逃避的，因为我们与其他国家与人民的相互依存关系既广泛又真实。近几十年来，这种相互依存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发展，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则有所减弱。因此，几乎每一个国家，其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常常同时受到若干个来自相反方向的力量的制约，而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繁荣，甚至人类的存亡，都可能取决于这种多方力量对抗消长的结果。

国际关系极为重要，对它有任何忽视都是不应该的。但国际关系同时又极为复杂，对它仅粗浅观察一番是很难洞悉理解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争取更上一层楼。在遇到急诊时，所有受过医疗训练的人都有义务对患者进行急救和其他救护，在医学上，我们知道

病人虽是疾病的受害者，但常常又是自我康复的主体。对公民来说，道理同样如此：他们既有可能成为政治的受害者，但又有可能作出努力去改变政治、改变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有机会和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责任为其他人提供最好的帮助，从而使我们大家都成为国家和世界上有知识、有能力和负责的公民。我们必须尽力抓住问题的关键，努力帮助所有人去应付当代出现的周期性国际政治危机与紧急事件。

但是，能力与同情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医学上，一个本意良好但无医术的人不是好大夫，而是庸医。在紧急情况下，这样的庸医很可能会断送病人的生命。在政治中，觉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准确信息的群众，对成千上万人包括对他们自己的自由及生命来说，将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在我们这个时代，汉堡、柏林、广岛和东京的废墟已成为因对国际政治愚昧无知而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标志。因此，我们应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可能获得的资料，尽可能深刻地、细致地和认真负责地研究国际关系。世上没有一种学科能像国际关系研究那样，会对这种曾被美国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称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选择”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

本书只能对这种研究作一简介。简介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即国际关系的实质。第二部分提出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世界政治中的各种角色。第三部分对国家间的控制与冲突过程进行跟踪分析，看它们是如何导致战争的。这部分还包括新写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和“非正式”战争的一章。第四部分，也即最后一部分，将探讨人类在寻求和平与寻求有益而有效的行动方面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的一些步骤。

